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 临安研究（续）下

辛 薇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 临安研究（续）下

辛 薇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 (续上下) / 辛薇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1-011234-3/

I. ①南… II. ①辛…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南宋

②临安市-地方史-研究-南宋

IV. ①K245.07 ②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7519 号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上下)

NANSONGSHIJI NANSONG DUCHENG LINAN YANJIU (XU)

主 编: 辛 薇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徐 晖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厂: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71.25

字 数: 1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1234-3/

定 价: 19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下)

- 宋蒙白鹿矶之战述论 杨倩拙(1)
- 南宋国家和宫廷藏书的恢复和重建
——以高宗、理宗为例 顾志兴(12)
- 论南宋戏文的思想性、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徐宏图(28)
- 《王魁负桂英》故事在宋代的变迁及其政治道德意涵 杨 果(42)
- 宋代佛教清规与国法
——以僧尼治罚问题为中心 石川重雄(51)
- “超子入经”与“经子两属”
——南宋《孟子》的目录学归属问题 王 宇(66)
- 关于朱熹与书院关系的几个问题 粟品孝 熊 瑜(73)
- 朱熹理学概论 朱瑞熙(80)
- 朱熹纂修史书的贡献与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王德毅(98)
- 朱熹陈亮王霸之辩申论 张希清(118)
- 陆九渊与吕祖谦、朱熹的吏治思想比较 邢舒绪(133)
- 狂态痴情陆放翁 邹志方(153)
- 杨简社会改革思想探析 张 伟(171)
- 略论“朱陈之辩”
——兼谈南宋理学与事功之学对立的实质 陈国灿(181)

2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下)

略论陈傅良的学派、思想和风格

——读《通考·止斋曰》札记…………… 杨国宜(192)

立法、变法

——论南宋陈傅良的法制理念…………… 肖建新(229)

“内举不避亲”: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 王瑞来(242)

刘克庄的司法活动述论…………… 屈超立(264)

魏了翁的门生、书院与鹤山学派

——从考辨《宋元学案》的《鹤山门人》谈起…………… 邱逸凡(278)

留正与光宗朝后期政局

——留正研究之四…………… 张其凡 王冬梅(318)

赵范、赵葵研究…………… 汪圣铎(336)

李庭芝绝非民族英雄…………… 俞兆鹏(355)

试论南宋灭亡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何忠礼(370)

《宋史·地理志》讹误举例…………… 李昌宪(382)

略论《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 汤勤福(399)

《曲洧旧闻》、《南窗纪谈》真伪辨…………… 李裕民(411)

《皇朝中兴系年要录节要》考…………… 辛更儒(424)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

原本的文献价值…………… 李伟国(436)

李攸《宋朝事实》的编撰及其史料价值…………… 罗炳良(450)

《容斋随笔》的史评成就管窥…………… 陶晓姍(464)

《淳熙三山志》史料价值初探…………… 苗书梅 曹臻(474)

“千品”解及其他

——(南宋)王应麟《小学紺珠·职官类》札记…………… 龚廷明(492)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 王水照(500)

先茔碑记与宋元时代家族组织…………… 魏峰(516)

南宋布袋图与布袋像赞…………… 李辉(526)

古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源流考…………… 姜青青(538)

宋蒙白鹿矶之战述论

杨倩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发生在公元1259年(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古宪宗九年)冬至1260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忽必烈中统元年)春的白鹿矶之战是宋蒙战争中的一次规模不大、但却颇有政治影响的战役。

元人作《宋史·贾似道传》,为塑造贾似道权奸的形象,竟然胡编乱造:“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山,合州守王坚使阮思聪蹕急流走报鄂,似道再遣京议岁币,遂许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张杰、阎旺以偏师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杰作浮梁新生矶(作者按:新生矶在白鹿矶对岸),济师北归。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以致数百年来,谬种流传,以讹传讹。有鉴于此,故撰此文。

一、战役背景

1258年(宋理宗宝祐六年,蒙古宪宗八年)二月,蒙哥大汗发布了三路攻宋的命令:中陆军由皇弟忽必烈率领,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南路军由兀良合台(亦作兀良哈台、乌兰哈达)率领,由云南进攻广西、湖南,与

2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下)

中路军相呼应;蒙哥自己则亲率西路军进攻四川,东出夔门。同时,又命山东的李璿出兵对南宋淮东地区作牵制性攻击。

蒙哥原计划在三路蒙古军会师荆湖后,再顺江而下,占领临安,一举灭宋。但在具体实施中,因种种原因,三路蒙古军在战术上缺乏协同,实际上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展开作战的。

蒙哥率领的蒙古西路军在 1258 年冬便对四川宋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至 1259 年七月,因蒙古围攻钓鱼城失利,蒙哥病死在金剑山的温汤峡(今重庆北碚的北温泉),蒙古西路军不久便解围北撤。

忽必烈率领的东路蒙古军直到 1259 年八月才渡过淮河,分兵并进,至黄陂(旧治在今湖北黄陂北)。九月一日,蒙古亲王穆哥派遣的使者来到忽必烈军中,向他报告了蒙哥的死讯,“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①。但忽必烈认为既已南下,不能无功而返,于是指挥麾下蒙古军三道并进,渡过长江,围攻鄂州城。

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南路军在 1258 年八月由云南出兵攻入广西,但由于军中瘟疫流行、军事进展不利,被迫于十二月撤回了云南。1259 年六月,兀良合台率部沿原路再次进入广西,舍城不攻,快速前进。广西宋军也多据城自守,不主动拦击。因此,蒙古军得以在未经激烈抵抗的情况下经武缘(治今广西武鸣)、宾州(旧治在今广西宾阳东北)、柳州、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进入湖南。又取道全州、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衡州(治今湖南衡阳),于十一月进抵潭州城下,派人与围攻鄂州的忽必烈取得了联系^②。

南宋方面因四川方面战事危急,宋理宗于开庆元年(1259)正月便任命枢密使、两淮宣抚大使贾似道以枢密使的头衔出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全面指挥抗蒙战争,并改命知靖州、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率军增援四川。贾似道坐镇峡州(治今湖北宜昌)指挥,吕文德则率军击败在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蔺市江面阻击的蒙古军纽邻部,进入重庆。

在蒙哥病死、蒙古军主力撤出川东后,贾似道闻知鄂州有警,便又率部顺流东下,进驻汉阳军(治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指挥宋军全力抵抗蒙古的

进攻。不久,从重庆率军东下的吕文德也赶到了汉阳,并冲破蒙古军的阻截,乘夜过江,突入鄂州城中,大大加强了鄂州、汉阳的城防力量。

蒙古军围攻鄂州的消息传到临安,中外震动。宦官董宋臣、宰相吴潜都劝说理宗迁都,朝野弥漫着一片失败气氛。但宋理宗没有接受迁都的意见,他一面下诏责己,一面下令诸路宋军进兵支援鄂州,并拿出大量内库钱财充作军费。宋理宗一面派特使到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一面又派遣御史陈寅赴淮东,督促淮东调兵五万增援上流;一面又命令侍御史沈炎往沿江制置使司,督促其迅速派兵援鄂。沿江制置使马光祖受命移驻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则受命移驻寿昌军(治今湖北鄂州),以应援鄂州、汉阳。

鄂州、汉阳的攻防战异常激烈。宋军夹江而战,鄂州城中的宋军“死伤者至万三千人”^③,鄂州统制张胜也战死于汉阳。而蒙古军损伤也极为惨重,至十月末,“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宋军在鄂州城防薄弱之处又抢筑了新月城,从“西南隅抵东北隅”,“上可并行大车,排槎串楼,缔构重复”,坚固异常。忽必烈谋士派郝经与张仲一去观察新月城的虚实,郝经回来向他报告,称其“必不可攻”。

这时,忽必烈的妻子派遣使者脱欢、爱莫干来到鄂州,报告说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已遣阿兰答儿等调兵于大漠南北,图谋称帝,请忽必烈迅速北还。十一月二日,郝经也恳请忽必烈立即班师,并提出建议:“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迅速北返,与阿里不哥争夺帝位^④。经过反复权衡,忽必烈声称将率兵进攻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人指挥部分蒙古军佯作继续围困鄂州,并派大将张柔率部南下接应潭州的兀良合台所部北返,自己则于闰十一月初率主力北返。忽必烈离开鄂州后的第六天,蒙古大将拔突儿等人也根据忽必烈事先的安排,迅速从鄂州解围撤军了。

二、白鹿矶之战

兀良合台率军进入湖南后,于十一月开始围攻潭州。南宋湖南制置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湖南提点刑狱胡颖率领军民坚守城池,多次挫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在潭州城下顿兵一个多月,蒙古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此,兀良合台在接到忽必烈撤退的命令后,便迅速解围北撤。

受忽必烈之命负责接应兀良合台所部北撤的张柔派遣也里蒙古领兵两千南下潭州^⑤、铁迈赤“将练卒千人、铁骑三千”驻岳州(治今湖南岳阳),以接应兀良合台^⑥。但因宋军在湘阴一线拆断桥梁、设防拦截,蒙古军无法从岳州南下。另外,兀良合台一军的前锋北进至湘阴县界时,则因两次战马无缘无故地伏地不起,遂不敢入湘阴^⑦,于是,兀良合台一军被迫兵分两路,一路直接绕过湘阴北上,与从兴国军(治今江西兴国)、寿昌军(治今湖北鄂州市)南下的蒙古军合师,一路则由醴陵(今属湖南)而进入江西,经袁州(治今江西宜春)、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瑞州(治今江西高安)一线,辗转而往寿昌军。

为接应兀良合台所部渡过长江,蒙将张柔奉忽必烈之命,“总领蒙古、汉军城北鹿矶”^⑧,在白鹿矶架设浮桥,并修筑简单的城防,以确保白鹿矶浮桥的安全。

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与寿昌军隔江相对。新生洲,在黄州州治“西北三十里”的“团风镇下”,“亦曰新生矶”^⑨。当时的团风镇即今黄冈市的团风县。《大清一统志》卷二五八《武昌府》又记载:“白鹿矶在武昌县西九十二里神人山下,与黄州新生矶相对,为江滨险要处。”清代的武昌县即南宋的寿昌军。《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记载:“神人山,在武昌县西九十二里。《历代帝王记》云:吴建衡二年,有神人乘白鹿从此山出,故名。”此为白鹿矶之来历。

开府于寿昌军的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得知蒙古军在新生洲一白鹿

矶的江面建造浮桥的消息后,听从其参议军事刘子澄的意见^⑩,发兵对占据白鹿矶的蒙古军发起进攻,想趁蒙古军立足未稳而将其消灭。由于低估了蒙古军的战斗能力,加之是逆水作战,宋军结果被蒙古军击败,武功大夫、沿江制置副司咨议官吕文信战死,寿昌军随即也失陷了。

吕文信是吕文德之弟,其阵亡之事,对南宋震动很大。事后,宋理宗下诏“赠吕文信宁远军承宣使,立庙赐额。子师宪带行阁职,更与两子承信郎”,其同时战死的部将辅周也被赠予和州防御使^⑪。史岩之则因此战的失利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轻信狂生,欲邀奇功,遂使已去之虏回戈致死”^⑫,遭到严厉处分。刘子澄则被贬谪封州。

南宋朝廷得知吕文信战死的消息后,一面于开庆元年年底紧急抽调淮西大将夏贵率军逆江而上,接受开府于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市)的沿江制置使赵葵的指挥,驻防丰城(今属江西),以屏卫隆兴府;一面派遣都官郎中林光世急赴鄂州,催促贾似道率兵南下。当林光世行至黄州时,贾似道已经从鄂州到达了黄州^⑬。

在从鄂州到达黄州的途中,贾似道一行在苹草坪^⑭曾与一支北撤的蒙古军遭遇。当时,大将吕文德派遣孙虎臣带领精兵七百护送贾似道。与蒙古军遭遇后,“虎臣匿似道,自挺身出战”。由于蒙古军只是由降将储再兴领路北返的老弱辎重队,没有太强的战斗力,因而很快便被孙虎臣的人马消灭了。^⑮这本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转向了两种极端——吹捧贾似道的人将其吹嘘为一场大捷,而攻击贾似道人又将其改编为贾似道的一段丑事。

在黄州,林光世向贾似道传达了宋理宗的旨意:对蒙古军“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入”^⑯。这个意见原本是监察御史饶应子提出的,其要点就是不要再采取史岩之那样的行动,不能将蒙古军堵死在长江以南予以消灭,而是要将其赶过长江,放开一条路,让其北撤。

为防止宋军从下游进攻白鹿矶,蒙古军的战船一直游弋到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蕲春镇)一线,进行警戒。宋将夏贵奉贾似道之命,率军由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逆流而上,进兵鸿宿洲,^⑰在漳源击败蒙古军,缴获舟船三百余

6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下)

艘;又战于黄石港(在今湖北黄石市一带),缴获战马三十余匹。夏贵指挥宋军继续推进,乘胜收复了寿昌军;又在黄州团风镇一带与蒙古军交战,缴获舟船七十余艘,“去白鹿矶二十里而近”,^⑧直逼蒙古军架设在新生矶(在今湖北黄冈市西北)与白鹿矶之间的长江浮桥。

在这里,由贾似道督战,夏贵指挥所部对蒙古军发起了进攻。《夏贵神道碑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时南北两岸毡帐为满。先是,下流舟师多失利,公以计悉引兵,浮桥上流,昼攻夜击其北岸,以舟师阵于白鹿矶浮桥下。贾丞相督战,公方率舟师交战,夜登岸陆战,夺所掠耄倪三千余人还。有忌公功者,谗于朝,谓公不战南而战北岸,公以书遗丞相,谓:“毡庐虽满南岸而辎重尽在北岸,所以夜击昼攻于北岸者,救其所必救也。俟其拔毡庐以救辎重,因扫其南巢,以速其北走。不出三日,江可肃清矣。”乃部分其军出战:某军断桥,先上桥者有上赏,次者次之,违者以军制论。每夜五更一点至桥下。桥上皆设备,公皆不战而退。是夜,先一更至桥下,公子松最先上桥,推桥上兵悉投之水次。戴祥次、苏才并力而上,一鼓而桥尽断,明尽夺其舟。明日,江南无一骑;明日,江北无一舟,江面肃清。

由此可见,此次作战由于贯彻了宋理宗“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人”的旨意,而采取了“扫其南巢,以速其北走”的作战方式,等到南岸蒙古军大多已经渡过长江后,宋军才在夏贵之子夏松及其部将戴祥次、苏才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断浮桥。这样,兀良合台、张柔所部的蒙古军在几乎没有受到太大损失的情况下,在1260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忽必烈中统元年)正月完成了渡江北撤行动,白鹿矶之战遂告结束。

三、战役评价及相关史实的订正

综上所述,我们对宋蒙白鹿矶之战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人”的战役指导原则不是贾似道制定

的,而是监察御史饶应子首先提出而得到宋理宗首肯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战役指导原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符合《孙子兵法·军争第七》所谓“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基本原则的。

我们看到,在鄂州之战中,宋军主力云集鄂州,与忽必烈麾下的蒙古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蒙古军损伤极为惨重,至十月末,“诸军疾疫已十四五”^①;而鄂州城中的宋军也“死伤者至万三千人”^②,连鄂州统制张胜也战死于汉阳。因此,当时鄂州宋军主力一方面经过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另一方面又要防范新生洲的蒙古军回窜鄂州,因而无法分兵南下作战。贾似道奉命到黄州指挥下游以夏贵所部为主力的宋军作战,也只有孙虎臣带领七百卫兵护送。

从宋蒙两军的作战能力看,宋军水师有能力截断新生洲—白鹿矶浮桥,但步兵和骑兵却最多只能击溃北岸或南岸的蒙古军,而无能力将其围歼,甚至反倒可能被蒙古军击败。史岩之、刘子澄兵败就是明证。另外,如果截断新生洲—白鹿矶浮桥,那势必逼迫南岸蒙古军进行大范围的转移性举动作战,给长江南岸地区带更大的损失和恐慌。

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南路军在战略上是一支“斡腹之师”,曾先后攻入四川、广西等地,具有很强的长距离迂回穿插作战能力。其对广西、湖南的进攻,令拙于野战的南宋军队防不胜防:“寇未至则先抽外戍以自卫,寇至则坚闭四壁而不敢出,使蛮鞑数千乌合之寇残昭、容、柳、象,破全、永、衡诸郡及潭之诸邑。”^③给南宋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社会恐慌。

再看蒙古军侵扰江西的情况。

进入江西的蒙古军为加快北撤速度,一般是过城而不攻,先后只是顺道攻掠过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县)和瑞州(治今江西高安市)。这两座州城均无城池,没有防御能力。在蒙古军到来时,知瑞州陈昌世则在城破之前,被“百姓拥之而逃”^④,从而瑞州百姓没有伤亡。但临江军则因江西制置副使徐敏子故作从容状,“寓阆金凤洲,拥妓王妙日酣饮”,因而“士民恃敏子不迁避”^⑤。当蒙古军进抵临江军时,军民都惊慌失措。知临江军陈元桂不愿逃跑,“端坐亭上,誓死封疆。左右散去,为兵所执。握拳切齿,骂声不辍”^⑥,不

屈而死。而“制司近隔一水,终不调兵”。而且,当“士民趋浮桥将依金凤洲,敏子已断桥自保”,导致临江民众“迸拥入水死者十数万人”^⑧。当然,这里所谓“死者十数万人”自是夸大之词,不足为信,或“十数万人”之“万”字为衍字,但这也说明当时民众“迸拥入水死者”的事实已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

另外,袁州(治今江西宜春市)、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隆兴府、抚州(治今江西抚州市)的部分属县不仅遭到过境蒙古军的扫荡,而且还遭到了南宋军队的趁火打劫。姚勉曾在景定元年(1260)借轮对之机,向宋理宗揭发了宋军小校吴思忠、将领李虎在瑞州抢劫的罪行:

小校吴思忠,江东西宣阆本遣之戍豫章没口,闻敌已去瑞,乃不禀宣阆之命,提兵往来,自谓敌退之后,例有检拾。盗仓廩府库之钱粟,发城市富民之窖藏,连艘捆载而去。李虎继至摄郡,又尽其所未尽者而席卷之,毫孔靡有遗者。遂使瑞阳无力可以修复,合举城筑,为之孔艰。今摄郡之将虽窜南荒,所得既充,未失为富。而作俑之偏校,犹有漏网者。朝廷不知也。^⑨

由此可见,如果将蒙古兀良合台所部阻截在长江南岸,那势必会引发南宋更大的社会恐慌。这对急于结束战争以稳定后方的南宋政府而言,自然是不愿为之的事情。

兀良合台所部原本是一支贯彻“斡腹”的蒙古战略部队。这支“斡腹之师”从吐蕃千里跃进、绕道攻占云南、安南(今越南)后,便已经形成了对南宋的夹击之势,在这次战役之前,已经先后以云南为基地,攻入过四川和广西,随后又退回云南,对南宋的威胁相当严重。这次兀良合台奉忽必烈之命北归,尽管南宋方面不一定就知道其北归是为了协助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但无论如何,兀良合台的北归也是南宋方面求之不得的。因而,南宋自然不会将其阻截于长江之南,以防这一支“斡腹之师”在不能渡江的情况下再度回撤云南,使南宋依旧陷入两线作战的艰难境地。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兀良合台的北归实际上意味着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已经被迫放弃了实施了二十多年的“斡腹”战略。自此以后,无论宋蒙在

四川、襄樊、江淮一线的战事怎样激烈，也再无蒙古军从云南出兵配合作战以牵制南宋兵力的情况出现了。

第二，《宋史·贾似道传》“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的记述是张冠李戴。

《宋史·贾似道传》称在白鹿矶之战中，贾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这纯属驴唇不对马嘴之事。

刘整字武仲，原为金朝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州）人，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朝灭亡后，入宋，隶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积功至小校。后因善于教练战士，被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李曾伯所重用，提拔为将，累迁为潼川府路安抚使、知泸州，长期在泸州一线与蒙古军作战。1261年（宋理宗景定二年，忽必烈中统二年），因受到排挤而投降蒙古。

《元史·刘整传》等书未见刘整有献计“攻断浮梁”之事。刘整在降蒙之前，一直在四川与蒙古军作战，从未离开过四川。1259年（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古宪宗九年）正月，蒙哥大汗率领的蒙古西路军在集中重兵围攻钓鱼城的同时，又分兵四出，“破利州、隆庆、顺庆诸郡”，南宋“阆、蓬、广安守将相继降北”。为阻击下游援救重庆的宋将吕文德所部逆江而上，蒙古军“又为浮梁于涪州之兰市”，以致“蜀道梗绝”^⑧。三月，因形势危急，宋理宗同意了南宋政府“乞立赏格以激将士”以攻断涪州（治今重庆涪陵）兰市浮桥的建议，下诏宣布：“如能出奇斫桥袭寨，有显著者，旌赏有差。”^⑨五月，时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的贾似道上奏：“蜀江（雪）[水]涨，水冒桥趾，吕文德等与宣司所调兵数战皆克，攻断浮梁。”^⑩这样，历时数月的艰苦作战，南宋援军终于击败蒙古军，取得了攻断涪州浮桥的胜利，从而进入重庆。

刘整当时是否参与了这次作战，不得而知。据《元史》卷一二九《纽璘传》记载，蒙将纽璘在宋军攻断涪州浮桥后，奉命引军去成都，与都元帅阿答胡会师。“宋制置使蒲择之，遣安抚刘整、都统制段元鉴等，率众据遂宁江箭滩渡以断东路。纽璘军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战，斩首二千七百余级，遂长驱至成都。”由此可见，刘整当时在遂宁一带作战，而不在涪州的可能性极大。但是，作为一员颇有水战经验的骁将，刘整献计破涪州浮桥的可能性也

是存在的。不过,即使是刘整真有献计“攻断浮梁”之事,那也只能是在这次作战中,而与白鹿矶之战毫无关系。

刘整献计“攻断浮梁”之事,除《宋史·贾似道传》之外,在元人张枢所撰《汪端明(立信)仗节记》中也有记述:

初,己未岁,我师伐宋,四道并攻。似道为江淮宣抚大使,守鄂州。世祖在藩,帅大军围之。似道穷蹙援绝,鄂几下者数矣。会宪宗崩于合州,师还。宋守臣王坚以功告于国。南来元帅锡尔格攻长沙久不下,闻问,亦帅师而退。而亲王居守者作乱京师,我军上下未之知,似道微知之,因使人诣军中告其故,且请纳岁币以定盟。既师还,似道用刘整计绝流,取后军数万人,以战克闻。^④

但是,这里所谓“取后军数万人”,更是天方夜谭,不足为信。

注释:

①《元史》卷四《世祖一》。

②《元史》卷四《世祖一》。

③《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④以上引文并见(元)郝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

⑤《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⑥《元史》卷一二二《铁迈赤传》。

⑦《永乐大典》卷之五七六九,(宋)陈兰孙:《重修魁星桥记》;(宋)邵群美:《赵侯保民惠政纪实诗一十五首·纪哨马伏地十四》。

⑧(元)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柔)》。此处“北鹿矶”,当为“白鹿矶”之讹。

⑨《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三《黄州府》。

⑩(元)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六《跋刘玉渊〈道州九嶷山虞帝庙碑稿〉后》,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⑪《宋史》卷四五《理宗五》。

⑫(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七《进故事·壬戌(景定三年)七月初六日》。

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水村堂记》。

⑭“苹草坪”，简化字作“萍草坪”。《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七《进故事·壬戌（景定三年）七月初六日》作“苹草坪”：“臣虽不及前贤，惟愿陛下戒惧俭勤，常如虜偷渡时；大臣洪毅忠壮，常如苹草坪、白鹿矶时。”（元）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贾相寿词》亦作“苹草坪”：“所谓三月三者，盖颂其庚申苹草坪之捷。”但因字形相近，《宋史》、《宋史全文》又作蘋草坪。两相比较，当以“苹草坪”为正。

⑮《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十一月庚子。

⑯《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十一月庚子。

⑰《明一统志》卷六一《黄州府》记载：“鸿宿洲，在蕲州西二里大江中，秋冬有鸿集此。”〔雍正〕《湖广通志》卷八《蕲州》记载：“鸿宿洲，去州一里大江中，秋冬多鸿集。”

⑱（元）刘岳申《申斋集》卷八《大元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省左丞夏公（贵）神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⑲（元）郝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⑳《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㉑（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七《进故事·壬戌七月初六日》。

㉒《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元年正月甲寅。

㉓（元）赵景良编：《忠义集》卷三《临江军守臣陈公（元桂）》。

㉔《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元年正月甲寅。

㉕《忠义集》卷三《临江军守臣陈公（元桂）》。

㉖（宋）姚勉：《雪坡集》卷四《庚申（景定元年）轮对第二札（玉音问答附）》。

㉗《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正月丁卯。

㉘《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三月己酉。

㉙《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五月乙卯。

㉚《新安文献志》卷六五。

南宋国家和宫廷藏书的恢复和重建

——以高宗、理宗为例

顾志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自有藏书事业以来,官府藏书为重要内容。南宋建都杭州,皇家内府、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皆例有藏书。尽管“自来殿阁藏书,又深闳宫门,宁饱蠹鱼,禁不供阅”、“中国历来内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其余“公家藏书则复寥落无闻”^①,然而宋高宗重视文化,他自己喜爱读书、藏书,对南宋宫殿和政府藏书的恢复和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使国家藏书再度辉煌。理宗专辟缉熙殿作为读书、藏书的殿堂,至今仍有典籍传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一、高宗重视国家藏书建设,重建秘书省收藏典籍

南宋绍兴八年(1138)高宗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称行在所,示不忘汴都之意。靖康元年(1127)三四月间,金人先后掳徽钦二帝及后妃诸王以及官吏工匠倡优等数千人,同时将北宋立国以来所蓄积文物宝藏图书劫掠一空,辇载而去,就图书而论,毁损十分严重,有史为证:

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